

经济『寒冬』中逆风飞扬——
将迎来黄金十年
中国电影

本报记者 曹玲娟

6月13日,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众星亮相,佳片云集,黄浦江畔上演着电影的盛宴。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2008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达43亿,创作国产影片406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电影的黄金十年即将出现。在欣喜的同时,关注中国电影发展的人同样在思考着,面对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我们准备好了吗?

上影节报名影片达1925部
中国电影令人振奋

据主办方介绍,第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奖单元的报名影片达1925部,其中1270部长片分别来自79个国家和地区,创下亚洲地区电影节参赛影片数量之最,在国际同类电影节中增长速度最快。在若干年前,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明星寥寥、评委分量不足、参赛影片良莠不齐、国内电影人不愿意在国内参赛,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曾经遭遇的尴尬。

影响不断扩大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正是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2002年之前差不多10年时间,中国电影票房徘徊在9亿元左右,到2008年,这一数字迅猛上升到了43亿元。

“中国电影市场在10年内都会呈增长趋势,10年后电影票房达到100亿元肯定没问题。”在6月14日举办的电影节主题论坛上,北京新影联影业发行公司副总经理高军预测。他说,“10年前中国有1000多块有效银幕,今天这个数字变成了4000多块。”这无疑是一代电影人努力呼唤健全市场运作机制所取得的成果。

“中国电影从2009年之后成长速度会非常快,不会像前些年那样每年只增长一点点,而是可能会达到十几个亿、二十几亿。”博纳国际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信心十足。

对中国电影市场,人们大多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专家预测,随着国家扶持电影产业发展的政策逐步到位和社会资本的大量涌入,中国电影将迎来一个黄金十年。

全球化竞争已经到来
中国电影要踏实学习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电影市场逆势上扬,让人欣喜,但中国电影人还保持着相当的冷静。

电影类型的单一化,商业大片一统天下的局面,首先成为电影人热议的话题。上海国际电影节执行副主席、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表示,“一个成熟的电影产业格局,需要各种类型、层面的电影来支撑,不能仅仅只有商业大片。而现在,中国呼唤、追求和关注商业大片已经到了大家都觉得有点过分的程度。”

谈及原因,于冬认为,由于我国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包括创作、制作、后期加工、电影生产等,都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产业化改革时间太短了。”于冬分析,“我们从2002年开始研究商业电影,张艺谋的《英雄》打破了很多纪录,后来我们开始每年拍大片,也呈现了看似繁荣的景象。但这个过程也就是五六年。五六年间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电影产业,时间还太短。所以,中国电影市场的看似繁荣,其实是在不停复制部分‘大片’的盈利模式,并未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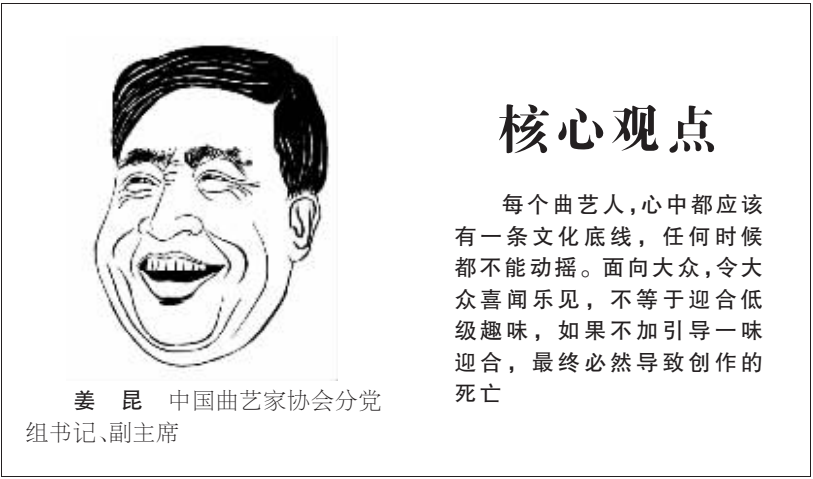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电影将面临全球竞争,对自身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冬说,现在香港的导演、制作团队转战内地已给内地电影界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而随着政策的放开与中国市场受瞩目程度的提升,更大的考验也可能出现,“我认为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是迟早的。”他表示。

因此,正视不足,苦练内功,成为许多电影人的共识。导演宁浩表示,“质量和市场必须平衡,能走到良性市场、成为经典留存的必然是质量高的影片。”他说,“好莱坞和其他电影产业水平高的国家,机制比较成熟,影片的质量和竞争力都很强,这会给中国电影带来压力和挑战。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去学习,从方方面面开始武装自己,在别人‘打进来’前武装好自己。”

新语

是迎合“多元”改变自己,还是改变自己引导“多元”

艺术创作要恪守文化底线



姜昆 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

核心观点

每个曲艺艺人,心中都应该有一条文化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面向大众,令大众喜闻乐见,不等于迎合低级趣味,如果不加引导一味迎合,最终必然导致创作的死亡

地生存,就需要我们用辩证态度去思考:是迎合“多元”改变自己,还是改变自己引导“多元”。

实际上,这也是当下文学艺术界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

现在“小沈阳”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

注,有人说“低俗”、“无意义”,有人说这代表了时代的选择……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前些天,我到长春调研二人转,看到台上演员表演十分卖力,台上台下的互动很热烈,非常具有感染力,值得借鉴。我们曲艺人该冷静思考一下,哪些东西是应该汲取的,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应该舍弃的。

我曾倡导曲艺同仁学习网络语言,学习英语,今天仍有必要强调这个问题:好的曲艺作品与时代从来没有脱节。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鲜语汇,忽视它们的存在,无视它们的影响,用简单的主流和非主流的方式来看待新的语境,对曲艺界来说至少是不明智的。我们需要新的思路,从而扩大曲艺创作和欣赏的受众面。

当然,任何艺术都要处理好教育性和娱乐性的关系。曹禺先生曾说过,最好

的戏是欣赏完后留给人们思考的余地,而不是剧场当时哈哈一乐、议论纷纷。缺乏思想、忘记传递思想信息的作品,注定是苍白的。作品如果只在技术上考究、形式上装点,无论多么精致,也无论当时能吸引多少“粉丝”,赚取多少收视率,都只能是一具速朽的空壳。

一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是要面向大众,但同时不能忘了提升大众的精神境界,养成他们良好的欣赏品味。现在的一些小剧场确实有低俗的东西。每个曲艺人,心中都应该有一条文化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面向大众,令大众喜闻乐见,不等于迎合低级趣味,如果不加引导一味迎合,最终必然导致创作的死亡。

人物素描为蔡淼川绘

更多“新语”,请见人民网文化频道
http://culture.people.com.cn

河北要求各地
不得截留教师编制

本报石家庄6月14日电 (记者王明浩)今后,河北将对中小学教师编制实行动态管理,每3年核定一次。河北省教育厅等部门严令各地,不得挪用、截留中小学教师编制,违规者将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河北决定从今年起重新核定中小学编制,全面清理挤占、挪用、截留编制等现象。清查出的编制,优先用于急需补充新教师的学校和英语、信息技术、艺术等紧缺学科教师的补充。

出版业首家博士后
工作站落户安徽

本报合肥6月14日电 (记者朱磊)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审核批准,全国首家出版传媒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安徽时代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日前正式挂牌。

据介绍,企业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在全国的文化产业中较少,在出版行业尚属空白。安徽出版集团及其控股的时代出版传媒公司,设立出版传媒业工程硕士培养点和项目孵化器,已联合招收培养近150名工程硕士。

中国为非洲培养
首批“双证书”硕士

本报天津6月14日电 (记者陈杰)中国为非洲培养首批获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硕士研究生,今天在天津工程学院被授予学位。经过理论考核、技能测试,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两位留学生顺利通过中国国家中级职业资格鉴定,成为“双证书”硕士。

天津工程学院上世纪90年代创立了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双证书制”(学生不仅取得毕业证书,还要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2008年培养出我国首批“双证书”硕士。

《潜伏》摘得
最多“白玉兰”

本报上海6月14日电 (记者曹玲娟)第十五届上海电视节近日在上海闭幕,16座“白玉兰”奖杯一一颁出,此前大热的谍战剧《潜伏》连获三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其中姜伟获最佳编剧奖,孙红雷荣获最佳男演员奖,最具分量的电视连续剧金奖也被《潜伏》获得。

滕华弢与宋丹丹凭借《王贵与安娜》、《马文的战争》分获最佳导演、最受欢迎女演员。而此前同样受到广泛关注的《我的团长我的团》颗粒无收。

天津大学建设首家
非遗保护数据中心

本报天津6月14日电 (记者陈杰、董阳)13日是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建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文献数据库,首次与出席第三届中国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论坛的中外学人见面,这是我国第一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

天津大学已投入300万元建立的文献数据库,存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获得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图片资料、几千小时的录音资料和上千小时的影像资料。

文化观察

一些申遗项目经过层层改造,变得面目全非

民俗为何变了味儿?

本报记者 董阳

6月13日是中国的第四个“文化遗产日”。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渐重视,各地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力度越来越大,申请非遗的热情也方兴未艾。但是,在这股热潮中,一些地方对非遗项目或随意改造,或过度商业开发,原本纯粹质朴的非遗开始变了味儿。

“很多地方的民俗歌舞申请非遗时,乡镇先改造,到县里再改造,到省里又改造一次,来到北京已经面目全非。”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巫允明教授研究民族歌舞近30年,看到经过重重“改造”后的非遗“歌舞表演”感到十分痛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频频“变脸”?怎样才能更好地传承非遗?14日,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田野的经验——第三届中国日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论坛”上,专家们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和建议。

苗族舞蹈化身霹雳舞
非遗项目屡被改造

“河北井陉县的‘拉花’秧歌本来非常有特点,扭起来肩、肘、腕连动。前一阵我看了一场非遗传承人的演出,肩和肘都不动了,就只剩下手腕花了,完全没了自己的特色,这跟别的秧歌有什么区别?”巫允明遗憾地说,目前我国各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实行层层审批,一些地方唯恐当地的民俗歌舞太“土”或者不够“美”,于是添枝加叶,随意改造,经过乡、县、省层层改造,到了北京就面目全非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教授也见过很多莫名其妙式的改造:侗族大歌改造成美声唱法,梆子戏改造成京剧,苗族舞蹈改造成现代霹雳舞……苑利表示,“一种文化能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而传承至今,说明这种文化必然有一种无法替代的魅力;改造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历史认识价值。”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说,很多地方有



6月13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泥泾(黄道婆)手工棉纺技艺在上海徐家汇公园举行展演。图为中学生展演脚踏棉纺车纺纱技艺。 劳任摄

贴窗花的习俗,虽然有的很朴拙,但是通过剪窗花、贴窗花,人们渐渐进入春节祈福的仪式中,这才是窗花的精神旨归,因此朴拙也是一种美,如果都按某些外行的意愿改得同样精致,谈何“文化多样性”?

日本1950年通过《文化财保护法》,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56年。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名誉研究员星野絃告诉记者,在此期间,日本也曾出现过将歌舞伎、能戏等舞台化的现象,但是又都由于经营困难消失了。原生态的民间歌舞经过舞台化改造的歌舞更有价值,如今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

商业化催生变味儿的民俗
保护非遗警惕“工具理性”

当非遗越来越受社会关注的时候,一些“聪明人”尝到了“非遗旅游”甜头。于是,那些原本在特定时间祭祀祖先的歌舞习俗频频在旅游景点的舞台上亮相,观光客看不懂的部分统统被大肆改造,不但失去了文化的个性,原本对祖先、天地和神灵的敬畏也荡然无存,只剩

下一张华丽而空洞的“皮”。

“最要命的是,很多地方将文化作为发展经济的工具来利用。祭祀祖先的仪式是拿来表演和消遣的吗?作为消遣的能不变味儿吗?”乌丙安教授反问。

曾多次到中国西南地区考察的星野絃也发现,中国一些地方将非遗项目当作“观光资源来利用”,他认为非遗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商业化对非遗来说,冲击太大,以至于无法把握。

“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被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指出,“很多地方将文化遗产简单地与地方政绩和经济收益挂钩。往往是某一遗产申报成功,列入名录,便大举开发。把文化遗产开发当作土地或矿产一样开发,其结果是热闹一时,不仅所获经济成果十分有限,而且会对文化遗产本身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文化涉及人的心灵和信仰,把信仰降低为一种工具,这种文化的矮化是非遗保护工作中一个最大的问题。”一位学者表示,“‘工具理性’的盛行使一些人失去了敬畏感,而民俗最美的地方恰恰就

是这种虔敬的精神。”

尊重文化的主人
文化自信是传承关键

四川省北川族自治县的羌族口弦艺人王安彦告诉记者,当地很多年轻人宁肯唱流行歌曲也不愿意学自己的传统歌舞乐器,他们觉得传统的东西“很土”。有学者表示,这种文化自信自卑也是非遗项目轻易被改造的内因。

“1983年,我到羌区时,这里的羌族人都穿民族服装,我还因为没穿当地服装,被当怪物一样指点了半天。但2002年再去时,牛仔褲、T恤衫已经随处可见,再也没有人议论我的打扮了。”巫允明说,真不知道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

在采访中,专家们也表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一定要尊重文化的主人,尊重主人的文化,这样才能调动起当地人民的“文化自信”,解决某些非遗项目后继乏人的难题。

金荣华教授来自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他告诉记者,每次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做完田野调查,他一定要把照片和出版的调查报告寄给接受访谈的老乡,还会和老乡保持长久的联系。金荣华说,他们是文化的主人,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受尊重的,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

巫允明还建议,非遗方面各个领域的专家要严格记录非遗项目的本来面目,国家有关部门也应该定期检查非遗的传承状况,防止“长官意志”和商业化的专家要严格记录非遗项目的本来面目,国家有关部门也应该定期检查非遗的传承状况,防止“长官意志”和商业化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肆意篡改。

“文化的个性站立起来了,文化的主体就有了自豪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表示,学者的工作就是做深入的田野调查,揭示文化的特性和意义,从而让文化主体挺立起来。

同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教授也提醒,既要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要把民众的主体性、现实境遇和要求切实地考虑进来,真正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变成一项发自民众而又服务于民众的事业。